

加拿大伸援手 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获自由

二零一二年元旦，对于法轮功学员林鸣立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经受中共十年迫害后，他终于获得自由。在加拿大政府的营救协助下，林鸣立摆脱贫长期被中共迫害的噩梦，与他在加拿大的哥哥林慎立团聚。

这对近十三年未见过面的同胞兄弟，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紧紧拥抱，热泪纵横。

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林鸣立被中共警察三次绑架，一次被强迫洗脑，二次被非法判刑，其间受过很多非人折磨。中共要他在“悔改书”上签字，放弃修炼。不过，经过十年磨难，林鸣立仍在修炼法轮功。

二零一一年十月，林鸣立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后，获得了加拿大移民部的签证。新年的第一天，他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国土。“我首先感



图：林鸣立（左）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与分别十三年的哥哥林慎立（右）团聚

谢加拿大政府和移民部的部长，以及国会议员斯科特·里德。”林鸣立在机场对记者说，“为把我从中共的系统中拯救出来，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林鸣立也感激所有法轮功学员为营救他所做出的努力。

“我非常高兴。”哥哥林慎立说：“这也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是正义

善心劝退持枪抢匪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了一名四十一岁的 7-11 店员，独自面对贼人持枪及炸弹打劫，非但没损失财物，反而以道理打动强盗，令他自动放弃行恶。其后多家报社报道了此事，在网上也引起热议。

这位被媒体称为“江先生”或者“江阿侠”的退贼英雄，真名叫邝森洽。谈起这宗二十四日凌晨四点发生在湾仔皇后大道东一百一十八号的 7-11 店的意图抢劫案，邝先生说，当时同事刚刚下班，店内剩下他一个人，突然见到一个大陆口音、戴口罩黑衣男子冲到柜台前，弯腰将枪放到台面，又把一个声称是炸弹的小盒子放到邝先生面前，手拿着遥控器，说这个是炸弹，只要一按就会爆炸了，叫他赶快把柜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邝森洽说，自己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那一刻“我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想到这个贼”。他没有拿钱出来，镇定地



图：工作中的邝森洽

面向那个年约三十岁的年轻人，以道理打动他。“我跟那个人说，哇，很大件事哦，你考虑清楚哦。我说，我们收银机里面的钱其实很少，而且有那个闭路电视在拍摄，我说你很难走脱了。我说，你想清楚吧，不要做这种傻事了，赶快走吧。这样劝他。”

那个贼人出乎预料地，整个人傻在那里，一直默默地听他讲，好象全听进去了。这时，有顾客进来，邝森洽直说：“有人来了，乖吧，快走吧。”后来这个贼人如大梦初醒，拿起手枪和炸弹就夺门而逃。

人们惊讶他的勇气来自何方？有媒体说他是佛教徒，邝森洽郑重地澄清，他不是佛教徒，（接下页）

的，所以加拿大政府才会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才会帮助我们法轮功学员到这里来。”

林慎立在零二年被加拿大政府营救来加国。同年，国会一致通过由议员斯科特·里德提出的动议 M-236，要求总理帮助营救十三名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监禁的加拿大人的亲属，其中包括林鸣立。

林鸣立对记者讲述了一些经历：“他们把你衣服全脱光，用五根绳子把你绑起来，然后用竹子抽打你。”这种抽打及不让睡觉是持续性的。“问你写不写‘悔改书’，不写的话就抽打你。”

林鸣立说，他看到一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用电棍电，导致大小便失禁，晕过去后被送医院。有一位学员的头皮被打掉了，也没送医院医治。

已获得自由的林鸣立，期望这场持续超过十二年的迫害早日结束。◇

回顾：十一年前的自焚案

十一年前的除夕（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自焚”，中共媒体极力强调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然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的。就在外界对此事件疑问重重时，一周后，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此事件的节目。把央视的录像慢镜头播放，会发现破绽百出，所谓的“自焚”只是中共为加重打压法轮功而制造的借口。

以下是破绽之一：“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烧死，她的头部附近出现了一只用力抡起的胳膊，刘春玲被一个条形物击中，随即倒地。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从来没见过她练过法轮功，她是从外地到河南的，在酒吧打工为生，常常打母亲和女儿。她不是法轮功学员。◇





全球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元旦快乐

二零一二年新年之际，世界各国、各行业、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感恩师父传出来的法轮大法让自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法轮功学员们同时表示，要真正实践“真、善、忍”的教导，一如既往地讲述法轮功真相，让更多有缘人听闻“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

善心劝退持枪匪匪（续）

（接上页）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相信善恶有报和神佛度人的道理，过去也多次以劝善方式令很多小偷放弃行恶。

“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这样纵容那种不正的行为，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也希望更多人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不想这个贼犯下这个罪。就是为他好，希望他不要做出这种傻事，回头是岸吧。”

谈起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机缘，邝森洽说，一九九六年在大陆表哥引导下，他走上修炼之路，法轮功重德修善，令他受益匪浅。但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远在广东汕头的太太也遭到非法判刑三年，他在香港四处奔走营救太太。“因为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自己也修炼了，看了自己太太这样无辜被抓了，两个小孩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会尽责任去营救她。”他的太太最终被营救脱险。

平常邝森洽也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公司对他工作表现很满意，最近还升了职。他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止恶扬善。◇

少年修大法 恶性心脏动脉瘤消失

（大陆来稿）我今年十三岁了，家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前段时间我患了重病，总感觉有块重物压在我的胸坎上，闷得慌。后来此物越长越大，凸出胸脯很多，每顿吃很少的饭，多吃一点就吐，非常难受。再后来就连撒尿都费劲了，身体越来越消瘦，学也上不了了。

爸爸带我去沈阳一家大医院去检查，主治医生说：“这个小孩得了这种先天性恶性心脏动脉瘤（直径为20cm），我们也是无能为力，除非手术能救这孩子，那也是九死一生啊，希望值很小，你们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听了，吓得哇哇大哭。最后全家人一商量，这没有把握的手术不做了，回家做保守治疗。并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手术需要十几万元）。

回家后，爸爸又带我去了几家特大的医院，检查之后都说不行了，治不了。后来一位中医给我配了汤药，我喝了两个月的苦药水也不见效果。

我的爷爷奶奶急得没法子。奶奶天天背着我流泪。后来爷爷又给我找了一位老医生，接着，我又喝了一个半月的苦水，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来到医院复查，医生对爸爸说：“这孩子顶多能活一个半月，回去后孩子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吃。”说完医生也流下了眼泪。回到家里后，全家人都无助地望着我。

就在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了我。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叫我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也奇怪，当晚我就吃了一碗饭，也不恶心了。没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身体好得非常快，脸色红晕了，身体也轻松了。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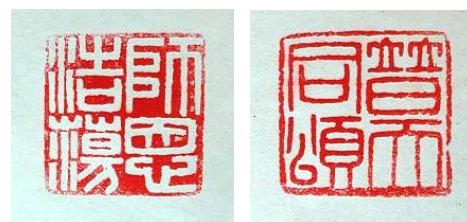
刚开始我只是看大法书，二十多天后，法轮功学员约我到他家教我炼功，半夜时，我突然恶心呕吐，吐了2-3大碗像牛奶一样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心里象打开了一扇窗户，轻松极了。

我别提多高兴了，我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个月后，再去医院检查，还是上次那位医生，看完检查结果，瞅瞅我，用诧异的目光问爸爸：“这孩子是在哪治的？都吃了什么药？怎么恢复得这么好？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放心吧，孩子已经完全好了。”

爸爸说：哪也没去治，就在家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夫连忙点点头自然自语说：“真是不可思议。”

如今我又回到了学校。平时我能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周围的人都说我变了，我的成绩也由原来的倒数几名升到班里前几名。◇



篆刻：师恩浩荡；普天同颂

国家体总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有效率高达 97%

1998年5月以来，国务院两次批示，将气功和人体科学归口到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国家体总根据这一精神，下达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并对在健身功法中发展最快，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法轮大法（法轮功）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调查了解。

为了配合体总这次调查，笔者同由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于98年9月对广东省约1.25万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

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男性占27.9%，女性占72.1%，50岁以下的占48.4%，50岁以上的占51.6%；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3.4%，通过2-3个月至2-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摘自中国大陆某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文稿）◇

四川舒安清被非法抓捕 律师调查受阻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晚,四川泸州法轮功学员舒安清在龙马潭区鱼塘镇石堡湾被拦路绑架,被关进古蔺县看守所。十一月三十日,小市派出所所长以为舒安清拿衣物为由,骗取舒安清的母亲开门,龙马潭区国保人员协同古蔺县国保人员闯入舒安清家中非法搜查、抄家。没找到任何违法的证据,仍然非法逮捕。

舒安清的家人聘请了北京律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北京律师前往古蔺调查案情,遭到政府,各司法部门百般刁难、阻挠。

一、在看守所受阻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舒安清的律师到达古蔺,立即到看守所依法会见当事人,律师向看守所接待人员出示了所有的证件。接待人说要看守所长邹强同意。找到邹强,邹说要办案人同意。律师说明,这是依照法律规定和正常的依法会见,不应该有这么多程序。看守所坚持不让见。

二、办案人以“涉密”为由刁难律师

几经周折,律师找到办案人,即国保大队队长张显文,律师给他看了所有的手续和证件,张说,你们下午三点钟来,给你一个答复,见或不见,或我们派人同见。

下午,律师到国保大队,教导员推说张队长(张显文)不在,必须张队长决定才能见。又托人找了张显文。等了一段时间,张回到办公室说,要家属填写“涉密案件聘请律师登记表”,填好拿去批准了才能见。律师再三向张显文解释,这不属涉密,如果是涉密案件,那就把认定涉密的批文拿来看。张显文拿不出批文来,却坚持要填表,无理的坚持这个不合法的程序。

律师反复向张显文阐明法律观点,还对他讲明白了当事人的家境情况,告诉他当事人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母亲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家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祖孙处境非常困难,希望他们不要为难当事人。律师以情以理与张交涉,并反复重申他

们这样设阻是违法的,是在剥夺当事人的权利。张显文自知违法,却说:“有人承担责任。”

三、局长个个推脱

律师又找到公安局分管看守所的胡局长,胡说要付(旭)局长和办案人同意才能见,他不能同意。律师去找付,说付出差去了;律师又从纪委书记,胡局长,王副局长,看守所长等等挨个找了一圈,推来推去,均无结果。

律师打了五、六次电话,找到分管国保的副局长付旭,反复重申办案原则,人性道理,方方面面给付旭说明会见当事人的正当理由。付旭推托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他在外面出差,要三十一号才回来。律师指出他们没有依法办事,付旭却说:错了,我们承担责任。

四、县长推到办案人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上班时间一到,律师去公安局,找局长、书记,均不在。找到公安局易副局长(女),说明来意,易副局长说,还得找付旭签字批准,才能见。律师说,等他回来已经放假了。律师给付旭打电话,请求付旭委托易代签,付旭挂断了电话。

律师又到看守所监管室找人,监管室无人;律师又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得知看守所监管室陈主任的电话后便与陈联系,陈主任认为依法会见是应该。便叫律师找局领导,说局领导协调来的快,他们协调有个过程。局领导已经被律师找遍了,于是律师就去公安局再找分管司法的聂副县长。

公安局层层挡驾,要登记,要预约,说要安排时间才能进。律师见有办公室门开着就准备进去,保安挡驾,把律师架走。律师质问挡驾人:你们违法设阻,不让见当事人,我依法办案,有什么错?岂有此理!律师好不容易见聂副县长,对聂说明来意,聂说过问一下。最后还是叫律师找办案人。当律师再找办案人时,张显文已不见人影,打数个电话均接接,发信息也不回。

成都丁惠的悲惨遭遇

丁惠,女,现年四十岁,成华区五一二厂职工。她的母亲王治容,五十九岁。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丁惠与母亲于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成都市成华区六一零及府青路办事处、派出所、五一二厂武保处、家委会的不法人员反复绑架、关押多次。在关押期间,王治容曾绝食抗议,恶人们怕担当责任,才放她回家。

为了避开骚扰,丁惠被迫带着母亲和四岁多的儿子小虎离家出走。但一直遭到邪党人员到处打听、跟踪,意图绑架。丁惠一家祖孙三代在外租农民的房子。因丁惠的丈夫已去世,她自己又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异常艰难。加上邪党人员的跟踪,母亲王治容时刻担心被绑架,长期处于恐惧中,身心遭到很大伤害,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含冤去世。二零零三年一月,儿子小虎也不幸在困苦环境中夭折。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四日,丁惠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新津洗脑班迫害。以下是丁惠自述在洗脑班遭迫害经历:

我叫丁惠,二零一零年三月份,我去给驷马桥社区的邪党书记廖正华讲真相,被廖正华伙同府青路派出所警察徐树清、成华区“六一零”的几个成员联合绑架,当天他们就将我劫持到新津洗脑班。

一进洗脑班黑窝,我绝食抵制迫害二十多天,洗脑班一帮人轮番对我暴力灌食,导致我掉了两颗牙。洗脑班还令二个“陪教”监视我,安排徐丹和周莉来“转化”我,逼迫我放弃“真善忍”信仰,。

从那以后,徐丹就很少来找我。但每天除了洗漱,他们不准我出门,强迫我看邪党电视洗脑。到了十月,洗脑班的曾某带着警察来,说是准备将我换地方,随后他们又派包小牧来

“转化”我,他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并未上当,最后“大杨”代笔写了“五书”,我不签字。

新津洗脑班恶人所采用的手段都是见不得人的。我被洗脑班足足非法关押、迫害了一年,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走出黑窝回家。

有一篇题为《走吧，要活着》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年仅二十岁的犹太人维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藏身于一间破旧的木屋。某日清晨，维奥拉醒了，却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门开了。那人站在她的眼前，维奥拉看清了他外套上的纳粹符号。

让她意外的是，这位军官（华伦士）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样，他转身离开了。她渐渐放松下来，过去关门。出乎她的意外，年轻的军官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给她，并对她笑了一下。

后来华伦士又来了，告诉她：“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维奥拉并未立即收拾东西，“为什么要救我？”原来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下来，“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来。”维奥拉转头看那件外套，“你杀了很多犹太人吗？”

“我没杀过人。这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传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选择



图：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右一）

可我可以选择。”华伦士回答。

这让人想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八月十九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大部份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他们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地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

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

一个公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渺小的，但是面对谎言与暴力，他可以选择屈从邪恶或者坚持正义。

上述故事给了当今的中国人最好的启示。古语讲“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特别是面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善恶正邪被中共宣传机器刻意颠倒时，我们更要拿出先天的善念，识破中共的谎言，拒绝成为暴政利用的工具。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还原历史：中共一再闹事 引发4·25上访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事实是，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此事甚至与“中南海”无关，他们去的是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上访的起因，是中共的一再“闹事”。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

● 中共历次整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诋毁法轮功。

● 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

● 1997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反映“尚未发现问题”。

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

织，不介入政治，学员都在做好人。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凭空给法轮功扣上“×教”的大帽子，试图杀良冒功，捞取政治资本。

● 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记者在北京玉渊潭炼功点采访法轮功学员的镜头，播放何祚庥（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对法轮功的诽谤。该栽赃节目播出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承认上次的节目失误，并播放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祥和晨炼的正面节目。

● 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19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

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无辜抓捕。

●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当晚十点，大家静静地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国际社会将4·25上访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平和的上访”。

然而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文／楚行）◇